

陈辉  
◆  
著

# 文化权力 与社会变迁

《红楼梦》研究的当代命运



(修订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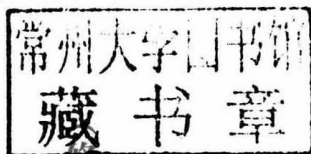


上海三联书店

# 文化权力 与社会变迁

《红楼梦》研究的当代命运

陈辉  
◆  
著



修订版



上海三联书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权力与社会变迁：《红楼梦》研究的当代命运/陈辉著.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9.10  
ISBN 978-7-5426-6281-1

I. ①文… II. ①陈… III. ①《红楼梦》研究 IV. ①I207.4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03970 号

## 文化权力与社会变迁：《红楼梦》研究的当代命运(修订版)

著 者 / 陈 辉

责任编辑 / 张大伟

装帧设计 / 徐 徐

监 制 / 姚 军

责任校对 / 朱 强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0030)中国上海市漕溪北路 331 号 A 座 6 楼

邮购电话 / 021-22895540

印 刷 /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9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640×960 1/16

字 数 / 310 千字

印 张 / 24.5

书 号 / ISBN 978-7-5426-6281-1/1·1388

定 价 / 68.00 元

敬启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021-66366565

## 内容简介

晚清以降,《红楼梦》是 20 世纪中国最受重视的一部文学作品,它与近代以来中国的社会精英发生了紧密性的知识性联系与碰撞。本书以《红楼梦》研究的当代命运探究变化社会中的文化符号,透过文本研究及其相关人物之命运、批判与论争来解读历史、社会、时代、管理与组织的多重镜像,分析不同阶段社会与政治的文化网络,文化权力与社会嬗变的知识谱系及其互动关系,梳理政治的跌宕起伏、研究话语与人物命运发生的紧密勾连,从思想行为层次深入探究中国的现代化,反思中国现代性的历程与经验。

全书内容丰富多彩,论证精到深刻。作者取用了详实的口述史料,系统梳理相关的文献资料,前有追溯,后有延伸,案例分析详尽细致,寓深刻的道理于清晰的阐释之中。

**关键词:** 文化权力; 社会变迁; 红楼梦; 组织机制; 文化网络; 现代性

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

——[中]孔子

从保守的视角来看，真理的核心在于文化，而不是政治决定了社会的成功；从开明的视角来看，真理的核心在于政治可以改变文化，使其免于沉沦。

——[美]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

研究 20 世纪中国的人太注重社会、政治、经济方面的历史，很少人注重文化。

——[美]李欧梵

# 目 录

导言：探讨文化的权力 .....	1
一、问题的缘起 .....	1
二、研究的综述 .....	3
三、研究的思路 .....	19
四、分析的框架 .....	21
第一章 文化的生长：《红楼梦》与红学 .....	22
第一节 红学：关于一本书的学问 .....	22
第二节 蔡元培与《红楼梦》 .....	37
第三节 胡适与《红楼梦》 .....	49
第四节 红学之争终归是学 .....	60
第五节 毛泽东与《红楼梦》 .....	77
第二章 文化的世家：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 .....	87
第一节 德清俞氏 .....	87
第二节 俞平伯与《红楼梦》 .....	98

<b>第三章 文化的挑战：两个“小人物”对俞平伯的挑战</b> .....	112
第一节 “小人物”所写的两篇挑战文章 .....	112
第二节 《文史哲》发表了“小人物”的论文 .....	120
<b>第四章 文化的领导：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b> .....	125
第一节 “小人物”的文章如何被发现的 .....	125
第二节 一封信的文本分析 .....	140
<b>第五章 文化的整合：《红楼梦》研究问题座谈会</b> .....	150
第一节 “《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会议 .....	150
第二节 对俞平伯的公开批判 .....	167
第三节 全国文联、作协联席扩大会议 .....	224
第四节 俞平伯公开检讨 .....	249
第五节 微弱抗争 .....	264
第六节 隔岸观火：胡适的看法 .....	280
<b>第六章 政治的文化：《红楼梦》研究批判</b> .....	287
第一节 “评红”运动兴起的原因 .....	289
第二节 政治社会化：运动的展开 .....	292
第三节 日常生活中的文化权力 .....	304
<b>第七章 市民的文化：《红楼梦》研究的多元回归</b> .....	314
第一节 早春——红楼梦噩梦不再 .....	314
第二节 俞平伯的平反与身后 .....	323
第三节 众多当事人，一把辛酸泪 .....	336

结语：国家、社会与文化 .....	353
一、国家、社会与文化的互动结构 .....	354
二、文化领导权与公共空间 .....	355
三、从《红楼梦》看传统帝国的兴衰 .....	358
四、现代国家治理的文化特质 .....	363
参考文献 .....	367
后记 .....	379

## 导言：探讨文化的权力

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

——克罗齐

向着真实

——王元化

### 一、问题的缘起

《红楼梦》是 20 世纪中国最受重视的一部文学作品，它与近代以来中国的社会精英发生了紧密的“知识性”联系。本书围绕《红楼梦》研究所发生的，影响深远的“知识碰撞”，蔡元培与胡适的红学论争，两个“小人物”对俞平伯的挑战以及毛泽东的红学观，改革开放以来多元红学的形成，深入思考文化权力与社会嬗变的知识谱系，反思中国现代性的历程与经验，探究国家、社会与文化良性互动的治理结构，即文化生产的内在机制是什么？权力与文化是如何互动的？如何实现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本书通过质的研究予以分析揭示知识生产与文化权力的真实世界。

《红楼梦》产生于中华文化的丰厚土壤，清代中期阅读《红楼梦》已蔚为风气，致有“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也枉然”的说法；高鹗曾

言“予闻《红楼梦》脍炙人口者，几二十余年”。<sup>①</sup> 20 世纪的中国，《红楼梦》可以说是最受重视的一部文学作品。鲁迅先生说，自从《红楼梦》诞生以来，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被打破了。<sup>②</sup> 《红楼梦》代表了中国古典小说的最高成就，传统的评点方法、题咏方法、索隐方法、考据方法及西方传入的小说批评方法、美学方法、社会学方法、话语分析法也纷纷将《红楼梦》作为中国小说中有效的诠释和研究对象。

《红楼梦》研究的当代命运处于学术、政治和文艺的多重网络之下，1950 年代初期被纳入政治轨道的《红楼梦》研究的批判运动，不仅对其后红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对 20 世纪中国的哲学与社会科学之学术品格、学术精神以至社会变迁的影响都是至为深远的。

政治文化在本书中有两层含义：其一是指社会的政治风格、政治态度与政治观念；其二指以文化的纬度探究政治变迁。知人论世为我国政治文化的优良传统，注重人物命运，反思时代机理。透过红学家的命运审视 20 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在心灵思想进程中某些原生态的东西，探析政治的社会化(socialization)过程。马克·布洛赫将社会思潮的波动，技术的更新和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视为决定人类命运的潜在因素。<sup>③</sup> 通过对《红楼梦》当代命运的解读，我们犹如在显微镜下清晰地看到文化生产的路径。不同观点红学家命运的沉浮，在这背后映现了政治思想、学术体制与公共空间的变迁。对《红楼梦》人物审美标准的变化，从铁姑娘时代步入淑女时代，从革命时代的“尊黛抑钗”到改

---

① 曹雪芹：《程甲本红楼梦》，沈阳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7 页。

② 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鲁迅学术经典全集》，北京燕山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232 页。

③ 年鉴学派重视“问题史学”，带着问题从深层因素去研究历史，探究“幸运的巧合”。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78、79 页。

革时代的“扬钗抑黛”，其背后孕育着民众社会心态的嬗变。

文化是观念的聚合体。<sup>①</sup> 文化的权力有两层含义：其一指文化的领导权、话语权与影响性，反映了精神、信仰与价值观对社会的内在支配力；其二指文化背后的权力运行，揭示了文化知识的生产机制。本书写作的缘起在于通过与一本书有关的学者之命运、论争与批判来解读社会、时代与历史的多面性，透过人、事件和政治之间的关系，来揭示文化的权力及其运行轨迹，从思想行为层次深入探究中国社会的现代化。<sup>②</sup>

## 二、研究的综述

本书基于《红楼梦》研究的个案视角，探究文化权力与社会变迁的内在机理。罗伯特·殷认为，单案例研究具有描述、探索与解释的功能，单案例研究可以成为解释性与学术归纳的基本方法。<sup>③</sup> 围绕本书的研究主题，研究综述如下所示：

### （一）文化权力与社会变迁

文化的权力研究肇始于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韦伯认为权力“意味着在一种社会关系里哪怕是遇到反对也能贯彻自己意志的任何机会”，从权力转变为权威有三种基本的形态，即传统型、魅力型

① E. B. 泰勒将文化视为“最复杂的整体”。克莱德·克拉克洪将文化依次界定为：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的总和；个人从群体那里得到的社会遗产；一种思维、情感和信仰的方式；一种对行为的抽象；一群人的实际行为方式的理论；汇集了学识的宝库；一组对反复出现的问题标准化认知取向；习得行为；对行为进行规范性调控的机制；一套调整与外界环境及他人的关系的技术；一种历史的积淀物；文化隐喻着一幅地图、一张过滤网和一个矩阵。格尔茨将文化界定为符合学(semiotic)的概念。参阅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译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4、5页。

② 金耀基将中国现代化分为三个递进层次，即：器物技能层次(technical level)、制度层次(institutional level)、思想行为层次(behavioral level)。器物技能、制度与思想行为三者间彼此影响，思想行为层次是一个文化的基本价值之所在，因此思想行为层次的现代化最难，也最必需，唯有这一层次的现代化才能促进中国全面的现代化。金耀基：《中国现代化的终极愿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9—13页。

③ 罗伯特·殷：《案例研究：设计与方法》，重庆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7页。

与合法型。其中技术上最完善的治理形式为合法型权威，即“建立在相信统治者的章程所规定的制度和指令权利的合法性之上，他们是合法授命进行统治的”。<sup>①</sup> 合法型统治的基础则在于文化。他比较分析了世界主要民族的精神文化气质与该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勾连，探讨了资本主义何以首先产生在西方。这其中新教伦理(the protestant ethic)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清教徒的精神气质在于“合乎理性地组织资本与劳动”。<sup>②</sup> 理性化帮助人们作出有节制的注重实用的决定，增强了资本主义对生产标准化的兴趣。清教徒的精神从荷兰到英国再到北美，一以贯之：“在一项世俗的职业中要殚精竭力，持之不懈，有条不紊地劳动，这样一种宗教观念作为禁欲主义的最高手段，同时也作为重生与真诚信念的最可靠、最显著的证明，对于我们在此也已称为资本主义精神的那种生活态度的扩张肯定发挥过巨大无比的杠杆作用。”<sup>③</sup>

韦伯试图回答的问题在于：为什么资本主义没有在印度、在中国予以有效展开？为什么科学的、艺术的、政治的或经济的发展没有在印度、在中国走上西方现今所特有的理性化道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在中国、印度、巴比伦，在古代的希腊、罗马，在中世纪都曾存在过，但那里的资本主义缺乏一种整体性“独特的精神气质”。这种贯穿于社会理性化的独特精神气质，主要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1. 基于劳作的天职观(calling ethics based on works)。人须恒常不懈地践行艰苦的体力与智力劳动，完成个人在现世里所赋予的责任和义务，将劳动本身作为人生目的，视劳动为天职，并且是获得上帝恩

① 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第 241、248 页。

②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7 年版，第 130 页。

③ 同上书，第 135 页。

宠的唯一手段，“惟有劳作而非悠闲享乐方可增益上帝的荣耀，……把劳动视为一种天职成为现代工人的特征”。<sup>①</sup> 韦伯认为失去信仰的科层制组织(organization based on bureaucracy)则会沦为奴役的铁笼(the iron cage)，如此，文化发展的最后阶段呈现为：“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这个废物幻想着它自己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sup>②</sup>事实上，天职观构成了西方文化特别是责任伦理的根基，由此产生了分工、专业、创新、效率、可计算化等近代社会的基本元素。

2. 基于平安的禁欲观(ascetic ethics based on peace)。新教世俗禁欲主义的本质特征在于束身自爱，严肃庄重的律法精神所形成的价值理性，律法具有凌驾于世俗权力之上的权威性与独立性，视戒律和秩序为核心，随时帮助人们作出有节制的注重实用的决策，从而具备明达事理、有条不紊的性格，认为禁欲得平安(asceticism leads to peace)。

3. 基于信任的心态观(mentality based on trust)。在韦伯看来，清教徒对教友的信任，由于受宗教的制约，这种信任具有“无条件的、不可动摇的正当性”。儒家所适应的尘世过于注意优雅的姿态，“儒家君子只顾虑表面的‘自制’，对别人普遍不信任，这种不信任阻碍了一切信贷和商业活动的发展”。<sup>③</sup> 信任是商业社会形成与发展的基本机制，以信任合作为特质的社会资本是提升民主质量的关键。

韦伯作为影响深远的社会科学家，其研究价值在于从文化的权力视角，透过比较研究(comparative study)解读社会发展的不同路径，深入分析现代性成因的内在机理，基于文化元素与社会理性化的生成逻辑如下图所示：

①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7 年版，第 123, 140 页。

② 同上书，第 143 页。

③ 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商务印书馆 1995 年版，第 296 页。



金耀基认为,若欲充分地理解在中国发展现代型国家的问题,仍需回到韦伯那里。<sup>①</sup> 韦伯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对中国资料的使用多为二手文献,由于韦伯缺乏独立阅读中文文献的能力,使得他对中国问题的研究显得过于宏观,实证性与严谨性有所欠缺。<sup>②</sup> 这也是文本研究所需要规避的问题,注重从宏观政治与微观行动相结合的视角,深度地挖掘原始材料,以详尽的一手资料,注重过程—事件研究作为基本方法。

就文化与社会相互关系而言,较有影响的学者是雷蒙·威廉斯与柯利福德·格尔茨。雷蒙·威廉斯认为 19 世纪以来文化主要有四种含义:心灵的普遍状态或者习惯;整个社会智性发展的普遍状态;艺术的整体状况;包括物质、智性、精神等各个层面的整体生活方式。文化的当下内涵“则包括了整个生活方式”。因此,借助文化可以对历史的本质进行深入探索。<sup>③</sup> 人类学家柯利福德·格尔茨将社会的形态视为文化的实体,文化是“由人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对文化的分析

<sup>①</sup> 金耀基:《中国发展成现代型国家的困境:韦伯学说的一面》,《二十一世纪》1991年第3期。

<sup>②</sup> 韦伯本人也认识到这一点,在写作《儒教与道教》时他说道:“具体论述时引用了其余的文献和翻译的原文。文献和碑刻的原文只有极少的一部分被翻译了过来,给我这个外行增加了困难。遗憾的是,身边没有一位汉学专家来检验我的工作。”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商务印书馆 1995 年版,第 45 页。

<sup>③</sup> 雷蒙·威廉斯:《文化与社会》,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1 年版,第 4、5、7 页。

是“一种探求意义的解释科学”即“分析解释表面上神秘莫测的社会表达”。<sup>①</sup> 由此，借助心灵状态与社会精神有助于理解社会变迁为何如此，将会如何，以及应该如何。

19世纪中日两国皆为自身辉煌的历史而自豪，但在面对外来的西方文明之时两国却有着不同的反应。罗兹·墨菲认为中日两国最大的不同在于：日本不会拒绝接受任何有用的外国理念，日本人长期以来从中国引进文化的经历以及他们对新理念的开放胸怀，是一笔巨大的文化资产，这使之得以全面引进西方的技术和思想，由此进行较为彻底的自我改造；中国的清政府皇室和绝大多数民众从内心深处是排外的，甚至反对洋务派官员“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改革措施，主张在保持中国文化主体不变的前提下引进西方的技术，因此当中国传统文化瓦解的时候，中国就不可避免地沉沦下去。最后的结果是中国在虚弱和耻辱的泥淖中越陷越深，而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却开始大踏步地前进。<sup>②</sup> 由此可见，中日两国居于主导地位的文化理念不同，支配了相异的社会变迁，形成了不同的政府治理机制，日本构建了近代化的中央政府(modern central government)，而清政府仍然延续了传统的中央帝国，在此背景下，清政府的内忧外患则不断加深。著名学者郭廷以认为任何民族的命运皆取决于其对时代环境的适应力，即“决之于文化”，“文化为人群谋求生存与生活需要的产物”。<sup>③</sup>

就文化与制度的相互关系而言，较有影响的学者是道格拉斯·诺思与塞缪尔·亨廷顿。新古典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思认为，17世纪的英国与西班牙都曾面临着财政危机，两国却走上了不同的发展之路

① 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译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5、32页。

② 罗兹·墨菲：《东亚史》，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年版，第381、398页。

③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页。

(contrasting paths),这反映了两国不同社会的深层性制度特征(deep underlying institu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ocieties)。在此基础上,美国与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之所以不同,在于两地所传承的不同文化结构。美国是英国的殖民地,延续的是联邦政体、分权制衡、私有财权的制度结构,拉丁美洲是葡萄牙与西班牙的殖民地,延续的是中央集权、官僚传统的政治文化。<sup>①</sup>

塞缪尔·亨廷顿则以韩国与加纳为案例,分析了这两个国家在1960年代处在同等发展水平,经济数据亦大致相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亦相似,初级产品、制造业和服务业所占比例彼此相近,绝大部分的出口皆为初级产品,接受外援的水平相似。但是30年后,韩国成为工业巨人,世界一流经济强国,拥有大量创业公司与创新产品,出口商品包括汽车、电子器材以及尖端技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西方发达国家水平,并且迈上了稳固的民主制度化进程。而在加纳,这些变化却无一出现,加纳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相当于韩国的十五分之一。究其原因在于韩国人重视节俭、投资、勤奋、教育、组织和纪律,而加纳的价值观却与之不同。总之,文化起着重要作用(cultures count)。莫伊尼汉(Moynihan)认为:从保守的视角来看,真理的核心在于文化,而不是政治决定了社会的成功;从开明的视角来看,真理的核心在于政治可以改变文化,使其免于沉沦(The central conservative truth is that it is culture, not politics, that determines the success of a society. The central liberal truth is that politics can change a culture and save it from itself)。<sup>②</sup> 本书的研究在于从文化路径分析社会现

---

<sup>①</sup> Douglass C. North.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 116.

<sup>②</sup> Lawrence E. Harrison, Samuel P. Huntington. *Culture Matters*. New York: Basic Books, pp. xiii, xiv.

象,探究现代政治的构建。

## (二) 新中国成立初期《红楼梦》研究的论争

20世纪《红楼梦》研究的成绩无疑是辉煌的,被公认为是关于中国研究的显学之一,<sup>①</sup>众多名人置身于其中的论争。王蒙说:“它是一门非常特殊的学问,是一门非常中国化的学问。”<sup>②</sup>顾颉刚在为俞平伯《红楼梦辨》所写的序言里划时代地提出旧红学与新红学两个概念。旧红学主要是由“评点”和“索隐”两个流派构成,其中以蔡元培的影响为最大,其代表作为《〈石头记〉索隐》。新红学是指以胡适为代表的考据派,注入杜威实用主义的考证方法,胡适认为,我们若想真正了解《红楼梦》,必须打破这种牵强附会的《红楼梦》迷学。其代表人物还有胡适的学生俞平伯、顾颉刚、周汝昌等人。1954年开展的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为当代红学阶段。由于领袖的关注,《红楼梦》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兴趣,《红楼梦》研究的主题成为中国政治生活进程的晴雨表。从1949年10月到1979年10月的30年中,全国的报刊发表《红楼梦》研究文章1500多篇,出版《红楼梦》研究专著50多种,公开或内部出版的各种《红楼梦》论文集、研究资料200多种。<sup>③</sup>

探讨《红楼梦》的当代命运,亦需要从毛泽东对《红楼梦》的见解及其革命文艺观着手分析。1954年10月毛泽东从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着手,继而掀起批判胡适的政治运动。1955年作家出版社编辑出版的《红楼梦问题讨论集》,四辑共收录重要论文129篇。事情的起因是两位“小人物”李希凡、蓝翎撰文批评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开始的。

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力图从细密考证、批评、校勘以及文学的视角研究《红楼梦》,其主要观点为:《红楼梦》是感叹自己身世的;《红

① 20世纪中国的显学是:红学、甲骨学、敦煌学。

② 王蒙:《双飞翼》,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339页

③ 胡文彬:《〈红楼梦〉研究三十年》,《学习与探索》1980年2期。